

海昏侯新论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海昏侯新论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昏侯新论 / 辛德勇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6

ISBN 978-7-108-06620-6

I. ①海… II. ①辛… III. ①刘贺—人物研究
IV. ①K827=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0643 号

责任编辑 张 龙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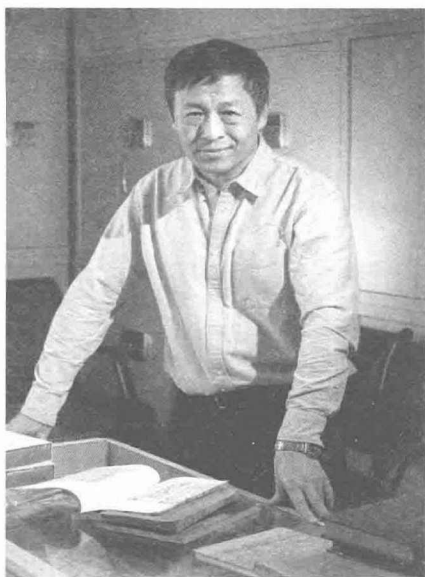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 数 166 千字 图 125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66.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作者近照 李伟 摄

辛德勇，男，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舆地文录》《石室牘言》《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祭獭食蹠》《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史记〉新本校勘》《书外话》《发现燕然山铭》《学人书影》（初集）《海昏侯新论》等。

目 录

自序	1
刘贺与西汉中期的宫廷政治	3
说“大刘”	31
刘贺是哪一天受封为海昏侯的?	37
海昏侯刘贺得的是什么病?	41
羹颉侯、东昏家与海昏侯爵号	45
彭蠡泽畔的落日斜晖	70
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	90
由刘充国印的发现再谈海昏侯墓园布局的方位观念	159
海昏侯刘贺的墓室里为什么会有《齐论·知道》以及这一《齐论》 写本的文献学价值	175
所谓“马蹄金”的名称与战国秦汉间金币形制的演变	185

自序

考古工作者发掘海昏侯刘贺墓的情况，是2015年年底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布的。这一情况公布后，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为帮助社会公众了解刘贺跌宕起伏的一生，三联书店约我写出了《海昏侯刘贺》一书。这本小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并被评为2016年“中国好书”。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广大读者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在《海昏侯刘贺》这本书中，有些问题，碍于体例，没有能够展开论述，而深入探究的读者，可能会有疑惑（如刘贺受封为海昏侯的具体时间以及他被废除帝位后究竟得了什么病）。对于这些问题，我后来写了一些短文，加以说明。还有些问题，其他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一些读者也不知何所是从（如“海昏”一称，到底仅仅是一个普通地名，还是特地给刘贺量身定做的贬义爵号），我又对自己的观点做了比较详细的补充论证。另外，我又在旧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刘贺的墓园和墓室出土的文献、文物，展开了一些新的论述（如刘贺墓园的平面布局形态及其与

汉长安城平面布局的关系、墓室出土《论语》残简的文献学价值、所谓“马蹄金”的政治文化意义及其与秦汉间金币形制的关系等)。这些内容，也都是人们在对他昏侯刘贺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想要进一步知悉的问题；同时也是对他昏侯刘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希望本书在社会文化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都能够有一些实质性意义的进展，并进一步思索由此引发的新问题。

衷心感谢三联书店愿意帮助我把这些文章編集在一起，提供给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当初撰写《海昏侯刘贺》一书，就是缘于三联书店的编辑及时注意到社会公众对这项考古新发现的关切，从而向我提出约请。相信仍然关心这项考古发现的朋友，会从这些文章中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新认识。

文集纂录既定，自忖撰写《海昏侯刘贺》时起对这项重大考古发现的研究方法，是自己在主观上一直注意不要过于狭窄地就事论事，尽量放开眼界，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看刘贺，在相关事项的总休框架中看待其具体特征和历史价值；或者说是想努力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手，观照通贯的脉絡以剖析具体的关节。限于天资和学识，做得或许并不很好，但自己还是努力做了，并且还是会继续努力这样做下去。

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就不仅是刘贺的身外之物了，更是他身后那个广阔的世界。

2018年9月29日

刘贺与西汉中期的宫廷政治

我在2016年出版的《海昏侯刘贺》这本书，是以西汉中期的宫廷政治为主线，或者说是以这一时期的宫廷政治斗争为背景展开叙述的。这样写，主要是因为刘贺本人的传奇性经历看似偶然，实则是由这条政治主线所决定的，其荣辱浮沉的经历是基于这一政治背景而产生的。我们看通行的历史年表，自古以来，就根本找不到刘贺这个废皇帝的位置。这主要就是因为他被隐没在身后强大的政治背景当中了。因此，不这样写，就无法准确把握其个人命运的本质特征，无法正确认识刘贺其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样写这本小书，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可以通过刘贺的跌宕经历，向读者展现西汉中期宫廷政治的内幕。这样的幕后政治，可以说是政治权力运作的普遍形式，或者说是必然形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站在幕布以里，还是幕布之外，看到的情形，往往大不相同。你不揭开幕布，就永远无法知晓真实的状况。

不管是专业的历史研究工作者，还是一般的社会公众，对揭

先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稿，题作《〈海昏侯刘贺〉书里书外的事儿》，文中对此已经做过说明。

2015年10月我出版的《制造汉武帝》一书，深入考辨了汉武帝晚年至昭宣时期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以为自北宋时期的司马光起到现代中国秦汉史学界所持“路线斗争说”实际不能成立，即在汉武帝和卫太子之间并不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汉武帝晚年也没有幡然悔悟，改变此前奉行的“尚功”路线，转而“守文”，从而使汉代政治的发展出现一个重大转折；武帝至宣帝时期的政治路线实一以贯之，汉廷治国路线的所谓转折性变化，是发生在元帝时期，而不是汉武帝后期。

《制造汉武帝》的观点，与中国学术界的通行说法，或者说在很多学者心目中的权威说法，差距甚大，但却算不得是我本人性情乖戾，独发奇想，非要标新立异不可，实际上，中国国内秦汉史学者尊奉为重大学术创见的汉武帝晚年政治路线转折说，是早已被日本学术界弃之不顾的废旧观点。抛弃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不用通行的“路线斗争说”来解析当时的政治史，而以实际居于核心地位的宫廷政治斗争作为主线，来解析刘贺一生的遭遇，而西汉的宫廷政治，纯粹是对权力、地位和利益的控制与争夺。历史事实如此，容不得做出其他的选择。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这样做看起来好看，讲这样的故事更引人关注，而是因为这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现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虽然颇有那么一些人很喜欢看日剧、吃日本料理，却对日本东洋史学者的著述不甚留意，甚至留学东瀛，身居“倭国”，也未必认真阅读过相关的论著，并对此做过深入的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撰文批评了我的看法。有人相与切磋，固然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好事，但在我看来，在学术视野上，这些人观照的范围似乎不够全面，对问题理解的深度也就不能不受到限制。

因此，今天在这里讲刘贺与西汉中期的宫廷政治问题，既然是以拙著《制造汉武帝》一书作为论述的基础，首先就有必要向大家说明我对相关批评意见的认识。简单地说，我对这些批评文章的学术论述内容，已经认真拜读，并表示衷心感谢，但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认同这些观点；或者说，我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各抒己见，这就是学术。

二

刘贺一生的重大跌宕起伏，不管登基为帝，还是废位成囚，都完全是由霍光一手造成的；即使是后来被汉宣帝远封海昏，也同样间接受到霍光操弄朝政的影响。诚可谓荣也霍光，辱也霍光，而霍光之所以能够权倾天下，操弄不止一位君主的立废，则由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安排直接促成。因此，要想清楚说明刘贺入居未央宫以及重归昌邑国故宫并最后命终于南荒海昏的经历，就

不能不从汉武帝晚年西汉王朝的政治格局谈起，而在这一时期政治格局中所出现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便是太子刘据对汉武帝施行巫蛊之术所引发的未遂政变，这也就是著名的“巫蛊之祸”。

在我研究之前，中外学者对“巫蛊之祸”起因的看法，几乎众口一词，都说是太子据受江充栽赃陷害，说本是江充为搞掉刘据而指使人预埋桐木偶人于太子宫中，以防他继位登基，对自己不利。本着这样的认识，就很难合理地解释汉武帝临终前对皇位继承人的安排，也就不能从根源上清楚地说明，何以会出现霍光专权以致擅行立废君主局面。

审视这些通行的说法，其文献依据，不过是《汉书·戾太子传》所记“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以及“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忘思之台于湖”这些浮泛的虚话，不少人仅仅依据这些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表述，就断定卫太子根本没有对汉武帝施行巫蛊之术。

那么，在此前提下，汉武帝为什么在从卫太子死后直至他本人去世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却一直空缺储位，不再新立太子？而且，汉武帝临终前又为什么不让业已成年的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或者昌邑王刘髡继位，却偏偏要把这汉家江山交给年仅八岁的幼童刘弗陵？这些，就成了很不好解释的问题。

正因为对此颇感困惑，近人吕思勉在所著《秦汉史》中尝谓“武帝末年，继嗣之际，事有不可知者矣”，甚至以为“昭帝之立，果武帝意与否，信不可知矣”，亦即怀疑为霍光私自操弄所致，而不是出自汉武帝的旨意。但实际上武帝遗命刘弗陵继位，

除了霍光以外，还有桑弘羊和金日磾一同在场，三人同知共闻，不可能是由霍光假传圣旨。特别是考虑到金日磾生前一直拒绝接受霍光伪造的所谓“封侯”遗诏，而一直以“侍中”身份随侍汉武帝身边的卫尉王莽的儿子王忽，还公开扬言：“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汉书·霍光传》）这意味着，对于金日磾来说，“封侯”的事儿是没来由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但刘弗陵继承帝位，是汉武帝的遗命，所以，他要承命辅佐。同样，对于王莽的儿子王忽来说，汉武帝临终前指示由刘弗陵继位做皇帝，这是他亲见亲闻，是真事；而封授霍光、上官桀和金日磾三人为侯的事，却是霍光等人私相授受，完全出于伪造。

综合分析当时各方面情况，我认为，促使汉武帝做出这一安排的直接原因，就是卫太子对他施行巫蛊并发兵反叛。

卫太子针对汉武帝施行巫蛊，肯定与其太子的地位不稳具有直接关系，但汉武帝是不是真的就一定会废除他而另立太子，却也看不到明显的迹象，至少这一点是很不确定的。

刘据的太子地位不够稳固，首先是由于他的母亲卫子夫出身寒微且从来也没有受到汉武帝特别的宠幸，卫子夫被册立为皇后，只是缘于她为汉武帝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纯粹是“母以子贵”。在嫔妃如云的帝王后宫，即使曾以貌以才深得其宠，冷落失宠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何况从未得到过宠幸的卫皇后了。

在卫子夫当上皇后仅仅几年内，就相继有王夫人、李夫人、

赵婕妤等嫔妃受到汉武帝的热烈宠爱，而且还都为汉武帝生下了小皇子，刘据这个宝贝儿子也已经不再稀罕，而汉武帝对王夫人生子刘闳、李夫人生子刘髡、赵婕妤生子刘弗陵，都明确表示过特别的爱幸之意。特别是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恩爱并没有随其去世而泯灭，因而就在卫皇后尚且在位在世的情况下，他就公然以皇后之礼对李夫人做了安葬，这也显示出汉武帝随时都有可能废黜卫子夫的后位，同时也会改立李夫人的儿子刘髡为太子。

刘闳和刘髡，在已有刘据早被立为太子的情况下，年龄稍大，便相继就封之国，离开了都城长安，这至少从体制上暂时解除了对卫太子的威胁，但刘弗陵甫一出生，汉武帝就公开将其与上古的神圣君主帝尧相比，“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汉书·外戚传》）。这意味着汉武帝至少一度萌生过用刘弗陵顶替刘据为太子的想法，就像宋朝人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当是时，太子犹在东宫，则孝武属意固已异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三《史赞评议》）

面对这样的局面，卫太子及乃母卫皇后自然是惶恐不安。然而，有这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一定会转化成为现实。这里面有几个因素，都会阻止这种可能性向实际方向发展。

第一，卫太子虽然不像司马光依据《汉武故事》所写的那么好，那么符合儒家理想的皇太子或是开明君主标准，但也中规中矩，并没有犯下什么罪过或是有什么不良行为，让汉武帝憎之恶之，以致非废除其储位不可。

第二，老父爱少子，这很正常，也很普遍。汉武帝是皇帝，同时首先也是个人，大多数人都这样。所以，因晚年得少子，喜悦中做出某些举动，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对帝位继承者的确定安排，不然的话，何不早些废黜卫太子以改立刘弗陵，甚至在卫太子去世之后空缺储位不补，而直至去世前两天才匆忙宣布把刘弗陵立为太子？

直到后来登基即位，刘弗陵也才只有八岁，他毕竟只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即使再天赋异禀，也不会显示出多强的治国平天下本领；况且从他直到去世的实际作为来看，只能说的不像后来的刘贺那样痴憨，却绝看不出有什么过人的智慧和能力。

汉武帝兴之所至，一时随便说说，与其实际运作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距离。我们在研究这一历史问题时，需要结合其他记载，综合考察，才能识破历史的真相。

第三，汉武帝一意求仙，希图永生长乐，统御天下千秋万岁，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帝位的承续看作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即使对卫太子不够满意，即使深深属意于小皇子刘弗陵，也大可不必做出这种在他看来只具有形式上之象征意义的安排。

我们看“巫蛊之祸”发生前江充“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的情况（《汉书·戾太子传》），就可以明确，直到此时，汉武帝也一直没有明确表示过废黜卫太子的意向，不然作为近侍的幸臣，江充何必会有这样的担忧？

然而，卫太子作为直接的当事人和可能的受害者，绝不能像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这样冷静，一定要对汉武帝易储的可能有所防

范，有所应对，可是在汉武帝的严密控制下，又无计可施，唯一能做的小动作，只剩下了像当时的愚夫怨妇一样，针对汉武帝搞蛊术，发泄一下心火怒气。要是碰巧蛊术奏效，真的咒死了老而不亡的汉武帝，就能把天下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再也不必担惊受怕。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所谓“巫蛊之祸”，也就发生了。针对仇怨者施行蛊术，本是当时十分通行的做法，若是没有江充介入侦缉，卫太子针对汉武帝施行的蛊术，也就仅限于他自己暗地里泄泄怨气而已。

然而，江充为除掉卫太子而进入太子之宫挖掘其施行蛊术的证据，使得局势骤然发生巨变。面对因希求长生不老而极其痛恨对其行用蛊术的汉武帝，卫太子走投无路，只好起兵拼死一搏，侥幸冀望硬闯出一条生路，而其结果却是身败名裂，满盘皆输。直至他嫡亲的孙子刘病已（刘询）登基做了大汉皇帝，本着“谥者，行之迹”这一根本原则，也不能不给他定以“戾”这一“恶谥”（《汉书·戾太子传》），以昭告天下万世他这一大逆不道且又“不悔前过”而发兵反叛亦即罪上加罪的重大罪行（《逸周书·谥法解》）。

在经历了“巫蛊之祸”以后，汉武帝对身边所有人的疑忌都愈加深重，各位成年的皇子，也不会例外。道理很简单，皇太子刘据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人已成年，而且有一批属臣宾客为其效劳，而这些成年的皇子，他们每一个人，都随时有可能再行巫蛊，或是干脆直接起兵犯难，置自己于死地。